

我的上海情结

◎江南

我这人从小就在外面漂，一直漂到现在。

我生于苏北，从能够记事的时候起就跟着那时还年轻的老爸在南通地区的几个县漂，一直漂了十几年；考上大学漂到上海，整整在上海呆了五年；大学毕业落户北京，直到漂来美国，在北京呆了三十多年；其间又在东欧苏俄漂了二十几年。为此，上海人称我是“江北人”，北京人称我是上海人，“毛子哥”则称我是北京人。

我在上海呆了五年，除了学到两门外语以外，还学到一口极为地道和流利的上海话。

因为我的父母亲后来从苏北调到上海郊区工作，全家也就成了上海人，我也就隔三岔五年地回上海探望父母兄弟姐妹。为此，说我是上海人绝对没错，说我是北京人也绝对没错，只是都不是正宗原包装。

对上海我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它在我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大大拓宽了我的视野，接受到了传统与现代交汇的海派文化。

清楚地记得，那年我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只身来到上海，当轮船穿过吴淞口进入黄浦江时，我被上海的繁华和现代深深震撼，尤其是

抵达十六浦码头时，外滩的高楼大厦使我这个来自苏北农村、土得掉渣的“阿乡”连连惊呼了几个“乖乖龙地冬”。这年的国庆节，我参加了国庆游行。入夜，我们全班来自江苏、浙江、山东、江西、安徽、湖北的同学从学校步行到南京路、外滩和人民广场观看夜

景。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观看夜景和节日焰火，如今四十年过去了依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那时的中国，刚刚走出三年饥荒的阴影和低谷。在中国普遍比较贫穷落后的大背景下，上海凸现的繁华令我振奋和惊叹，上海人的聪明才智令我折服，上海对中国的贡献之大更是其他省市难以比肩，那时在中国的国民经济总产值当中，上海占最大比例。

上海人创造了许多奇迹：

第一艘万吨巨轮在上海制造；

第一座万吨水压机在上海诞生；

上海的轻纺产品、日用品，质量全国第一；

上海的各项产品日夜不断地从上海港和上海站发往全国各地；

有专家说，北京如果不是全国的慷慨支援，绝对没有现在的繁华，而上海如果把支援全国的财物用于自身的建设，那绝对超过香港、巴黎乃至纽约。

六十年代，国人以用上海货为荣。那时的青年人结婚，讲究“三转一响”——上海牌全钢防震手表，上海产永久牌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加上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成为最高档次。

处于书生意气、风华正茂的我，很是以自己的户口入了上海市区感到高兴，并打算在上海成家立业，然而命运之神安排我去了北京。

尽管我在上海只呆了五年，但是在我的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上海的风情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我以后身居京城和漂流欧美的日子里，我时时回忆着在上海度过的五年岁月，因为它在我人生的道路上，是一座里程碑。在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只要我遇到上海人，我就用上海话和他们交谈，而一说上海话，便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亲近感和亲切感，一下子把距离拉得很近很近。



又见上海

◎江 南

正准备去大别山，接到弟弟电话，要我回去给父亲做周年祭。正好我的计划中要去上海拜访著名俄罗斯文学翻译家、高尔基文学奖获得者草婴先生，并和他商定《草婴传》的写作，于是我和草老打了个招呼，先奔往上海。

对上海我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我在这里度过了五年大学生活，在我整个人生的道路上刻下了重重的印记。在上海求学的五年，我对海派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天马、海燕电影制片厂的电影产品，丰子恺、张乐平的漫画，沙孟海、沈尹默、程十发、应野平的书画，胡万春、茹志娟、赵国华的小说诗歌，草婴先生翻译的《一个人的遭遇》，等等，使我这个来自苏北农村的土包子大开眼界，更对我日后走上文学艺术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70年我离开上海到北京，迄今为止在北京呆了38年时间，其间十几年在全国各地漂流，二十多年在欧美漂流，由此齐鲁燕赵文化、荆楚潇湘文化，皇城根儿文化，吴越文化，及至欧美文化的博大气象，渐渐融进了我的血液，形成了我的多元文化性格。然而不管我漂到哪里，始终注视着海派文化。在我看来，上海是国际大都市，引领时尚，横贯东西，纵贯古今，海派文化也一定会与时俱进。但是令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海派文化作为一个曾经引领潮流的地域文化，其行进的速度却落后于其他地域文化。这次到上海，有几件事情让我感触很深。

从老家办完事回到上海，我的一位有着亿万身价的企业家朋友，在一家五星级酒店宴请，并邀请了几位同样腰缠万贯、在上海滩上小有名声的企业家作陪。我的朋友明年就是六十，按照上海人的规矩，59岁庆六十，于是我请京城著名书家张才先生用两张六尺整宣分别写了一个“寿”字和一个“和”字，张才的大榜书寿字被誉为“中国第一寿”，在东南亚广受欢迎，其书写的和字曾被日本前首相中增根康弘和海部俊树珍藏，并把和字蕴含的精神内涵作为日本国民生活的准则。这么两幅字，

送给我朋友，绝对是份厚礼，然而我的朋友扫了一眼就放到了一边，而在座的其他几位企业家朋友也是无动于衷，这使我大跌眼镜。

说实在的，这些年我在商海弄潮，接触了全国各地的企业家，发现许多企业家并不是满脑子的经营策略，营销手段，而是有着很高的文化品位，具有相当的艺术眼光和鉴赏能力，使企业以文化为载体扬帆商海。说句不恭的话，现在连一些煤老板都在玩文化，然而置身于大上海的企业家至今还在酒文化、茶文化、食文化上徘徊，在餐桌上津津乐道于轩尼斯、马爹利、人头马，法国的波尔多、德国的斯图加特葡萄酒。在上海一些有点头面的大酒店，你可以发现其他都市绝对没有的一道风景线，那就是在酒店门首的玻璃橱柜里放着各种或半瓶、或1/3瓶喝剩的名酒。上面挂着主人的名签。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标志呢？是表示富有？还是表示身份？实在令人费解。

都说上海人好面子，确实不假。举个例子，有位朋友请吃饭，还请了几个他所熟识的朋友。在介绍我的时候，朋友说道：这位是美籍华人，著名旅欧作家，艺术评论家，书法家，著作等身——差点把我忽悠得钻桌子底下。饭后，我说兄弟你怎么这么忽悠呢？朋友笑道：你臭美吧，你以为我是夸你呢？我这是给自己脸上贴金呢。我要是说你是个在美国闲赋在家的退休老头，那多没面子！

我一直以为，站在中国与世界接轨前沿的上海，人们对现代艺术应该有着很好的领悟和认知，事实也并非如此。草婴先生的女儿在美国是位有名的现代公共视觉艺术家，被誉为首席华人现代艺术家，其作品被美国若干重要场所采用，在意大利威尼斯现代艺术展上受到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当然上海也有独具慧眼的，浦东的金茂大厦和香格里拉大酒店选用了她的十幅作品。那天拜访草老之后，草老夫人带着我到金茂和香格里拉去观赏作品。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当我站在作品面前留影的时候，从我们面前过往的人们（不是旅客）眼里充满了问号，其中有人把

我拉到一边问我：先生，这幅画是什么意思？

在外地人的眼里，上海人比较俗气，突出地表现在穿着睡裤、趿了拖鞋、拎着小篮头逛小菜场，穿着裤衩、叼着双喜、站在弄堂口看闹猛，其实这只是外在的表象，最主要的还是表现在言谈举止中间。也举两则亲眼看到的例子。

“王家阿姨，啥体生气啦？”

“哪能不生气，依看我孙子，迪个小祖宗，早晨起来，蛋糕不吃，皮蛋粥不吃，买了生煎包子还是不吃，叫伊吃牛奶皱着眉头，好像吃毒药一样。嘎好吃个末事勿吃，人家乡下小人想吃啊吃勿着。伊拉爷娘末在美国，小人末放了此里，我末当然要精心咯。依看伊长得嘎瘦，爷娘看见还以为是我待错伊勒。”

这话听起来象是抱怨，可实际上从头到尾都是夸耀。

还有一次是在浙江千岛湖，遇到一个来自上海的休假团，一个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午饭时分登陆蛇岛的一家饭店，哗啦啦围坐两桌。

“老板，把菜谱拿来看看。”一个头儿模样的人叫道。

老板见来了生意，赶紧送来菜谱，笑着站在一边。

悦在音乐之美（文接53页）

来衡量美。曾涤生说过：“凡作诗最宜讲究声调，须熟读古人佳篇，先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

1880年，美国诗人拉涅（Lanier）在他撰写的《英文诗的科学》（The Science of English Verse）一书中说过：“造成音乐的声音关系，与造成诗的声音关系，是一样的。音乐与诗的主要分别，若以科学的准确来说，乃是音乐中所用的‘音阶’，与人的声音所用的‘音阶’的区别。”刘勰写作的古典名著《文心雕龙》论“声律”中也有曰：“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声含宫商，肇自血气，先王因之以制乐歌。故知器写人声，声非学器者也。故言语者，文章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由此可见，诗与音乐不能相提并论，但是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诗中有自然之趣，音乐之美。例如，曹操的长子曹丕，就是一位既擅写歌词的诗人，又是古筝弹奏高手，他为《短歌行·瞻仰》一曲填写歌词，抚琴和歌，竟然使宫廷乐工们敬佩不已。又如苏轼，依据民间曲牌《念奴娇》填写的一首独唱曲《念奴娇·赤壁怀古》，留名音乐史册，成为千古绝唱。

视觉艺术的绘画里，也蕴含着听觉享受的音乐之美。美国音乐家马利翁就说过：“声音是听得见的色彩，色彩是看得见的声音。”色彩与音乐之间，存在着一种奇妙的潜在联系，因此，音乐家在作曲时，可以从

“你们有什么特色菜？”

“蛇岛有蛇，一蛇三用，蛇胆调酒，蛇皮凉拌，蛇肉可以椒盐蛇段，也可以做蛇羹。”

几乎所有的女宾叫了起来：蛇阿拉勿吃个，嘎恶影，吓人倒灶。

“那么吃肉菜。”

“屋里箱天天吃肉，油腻来。”

“那吃鱼，活鱼，清蒸红烧。”

“鱼么腥气来，勿好吃个。”

“那吃什么？”老板为难了。

只听一半的人异口同声地问：阳春面有哇？

“小店没有阳春面。”

“格末算了，还好阿拉带了方便面。老板，弄两壶开水就可以了，谢谢依啊！”

老板愕然——

上海在前进，浦东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但上海人的生活习惯和节奏似乎还是没有大的变化，这是一种习俗还是惯性，我还得细细捉摸。

色彩美中吸取灵感；同样画家在作画时，可以从音乐中获得配色美的启示。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国有一个被人们称为“雨人的天才”的罗铮，他是大脑发育不全的弱智少年，却对音乐具有大异于常人的感悟和记忆力，能够将音乐大师的名曲，化作色泽奇特、想象丰富的绘画作品。譬如，他画的《爸爸的第二弦乐四重奏》，就是倾听了作曲家父亲罗忠镕所谱写的《第二弦乐四重奏》，根据自己的心灵感悟创作出来的，画面是由四个不同的块面构成，有鲜蓝、深蓝、淡黄、金黄、桔红、棕绿和紫色，规整的构图中显现了变化。欣赏了斯特拉文斯的代表作《春之祭》后，罗铮在挥笔作画时，运用浓烈的色彩来表达大师的激情与躁动的极致，暗示了由盛转衰的悲哀情怀。德彪西在他的交响素描作品《大海》中，为了表现海洋的跌宕起伏，使用了七种丰富多彩的不同音型组合，罗铮便在寂静的幽蓝色海面上，以上疏下密的不同颜色，恰如其份地再现了这种组合。匈牙利现代音乐家利盖蒂，观赏到罗铮只画着一道道色条的《月光奏鸣曲》，感动地说，罗铮画出了他的心声。美籍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看过罗铮的画作，也情不自禁地紧紧拥抱起罗铮。

古希腊哲人柏拉图说过：“音乐的运动，等于人类灵魂的运动。音乐不是用以供无意义的快乐，乃是用以使灵魂获得谐调的陶冶，和情绪的镇静。”所以，发掘音乐之美，饱赏音乐之美，是人生的大乐。